

中国作家协会与“百花文学系列会议”

钟 媛

内容提要 百花时期的文学政策与精神传达是通过一系列文学会议来完成的，包括在党的八大影响下召开的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为主的系列局部性文学会议。这三次会议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统合及有针对性的会议精神传达展现了1956—1957年间百花文学发生、发展、高潮的探索过程，系统呈现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一组织机构通过文学会议的形式在“繁荣文学创作”的指导精神下转变文艺动向所做的努力。

关键词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百花文学；首届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

文学会议研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一度成为近年来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中的热点与“显学”。正是由于在共和国文学传统中，文学会议在传达党的文艺政策、制定文学发展规划、调整文艺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每个文学转折关键期，往往都会召开一场具有标志性的文学会议，对该阶段的文学发展方向、思想立场进行指导与部署。这既是“国家文学制度”^[1]的部分实践形式，又是引导当代文学生产、定调文学创作主流意识的重要推动环节。

在以往的文学会议研究中，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对当代文学发生重要影响的个案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而具有特殊意义的百花文学时期，却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这样具有标志性的、总纲式的文学会议，但百花文学的探索实践及“双百方针”在中国文艺政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又使得对这一政策的历史实践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学会议，显示出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事实上，百花文学时期是通过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这一系列文学会议，从不同侧面、不同群体进行分层分级召开并传达文学调整的精神与信息的，在这里我将其称作“百花文学系列会议”。目前有关百花文学的研究中，对于百花文学与苏联

“解冻文学”的对比研究较多，对于此阶段的新生作家、新的刊物及刊物方针调整也有不少关注，但作为系列会议的主体研究可以说基本没有。

之所以将这三次会议称为“系列会议”，是因为它们从属统一体系，均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导组织完成，执行相近的指示精神，其发生背景均与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与党的八大的召开有着重要密切联系。具体来说，这三次文学会议通过面向不同对象，在成名作家、文化官员（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青年作家（第一届青创会）及文学编辑场域（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中完成了文学圈内全面的政策传达、精神传递及实践策动；其次，这三次会议以普遍联系、相互扩展和运动变化的特点共同呈现出百花文学发生期、发展期的重要特点。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此次会议闭幕后仅十天，3月15日，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召开；年末，11月21日至12月1日，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召开。这三次会议在中国作协的统一组织下，逐步地、针对性地推行党的八大的会议精神，从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作出“繁荣文学创作”的指示，到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开创“青年作家”培训的传统，使王蒙、刘绍棠等一

批重要新生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再到文学期刊编辑会议的召开，实现文学刊物阵地编辑思想短时间内的集体转向，并促使一批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刊物创刊（如《诗刊》《收获》等）、改刊，这一系列的操作使得百花文学探索从犹疑走向高潮，真正以会议推动实践的形式在短时间内形成了显目的百花文学效应。因此，只有在系列会议的整体性观察中切入分析，才能有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百花文学在发生发展期的动员效应。系列会议的研究需要既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层面把握，同时也需深入微观个体进行研究；而深入微观研究时，既需梳理系列会议之间的动态联系、共同背景，也应呈现出这三次会议在发生时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百花文学系列会议”的召开情况作细部剖析，试图透视百花文学在不同阶段波动、演化的内部过程，进一步呈现其发生发展期的复杂性。

一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的“机动召开时间”与“扩大”形式及筹备情况

1955年底中央层面即积极筹划“八大”的召开，中央对于社会性质与社会历史阶段有了新的认识，由此，也认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建设对于知识分子的巨大需求。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商讨，决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即将开始的历史关键点前召开一次会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成立以周恩来负责，彭真、陈毅、李维汉、胡乔木、周扬、徐冰、张际春、安子文、钱俊瑞参与的十人小组，其后就此问题的调查和商讨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草案^[2]。这一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草案和批复显示出中央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变，由之前的“团结—教育—改造”（主要是“教育”与“改造”）迅速转变为团结、吸收与利用。1956年1月14日到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作为参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制定的重要人员之一，周扬已经最先接触到了上层信息。中国作协在这种形势下开始有策略地试图活跃文艺界，

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既为转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投石问路之举，呈现出转折时期诸多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理事会会议的“机动的召开时间”上。根据1953年10月24日中国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规定，“理事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主席团召集之，必要时由主席团决定提前或延期召开”^[3]。但事实上，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召开时间未按章程预计规定（首届召开时间为1953年10月），而是根据“必要时由主席团决定提前或延期召开”这一颇具机动性的附加条件来选择召开时间。这也就使得会议的召开时间可以解读出更多附属的时代、历史信息。郭小川作为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的重要筹备人之一，其日记也记录了这次会议召开的相关背景信息。1956年1月，郭小川提到有关“参加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内容：如“1月11日，到中南海去开关于知识分子决定草案的会”“1月16日2时半，到怀仁堂开会，发言人很多，听到很多精彩的意见”^[4]。从这里可以看出1956年新年伊始，更新之势如箭在弦上。很快，受“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影响，郭小川日记中出现了有关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筹备的信息。“1月17日，九时起，到作协，一起谈理事会的准备工作问题，拟出各种初步方案。”^[5]从郭小川的日记也可以看出，正是基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等新的政策动向的出现，中国作协相关负责人包括周扬、郭小川等进入了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筹备状态，并对上层的变化有了积极的接受与反应。于是，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在这个历史关口应运而生。

他们的接受动态反映在了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具体过程上。1956年《文艺报》第2期，“文艺动态”栏目中发布了“中国作家协会即将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公告，公告中说明“中国作家协会已决定于二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6]。接着，《文艺报》第3期又通过社论《迎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进一步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目的、计划等相关情况。按理来说，《文艺报》作为作协直属的机关刊物，在刊登作协的会议情况上掌

握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并且，从当事人郭小川的日记来看，他就是这篇社论的写作者^[7]，因而在这次会议的召开日期上应该是掌握了相对确切的信息的。然而，这次会议却又出现了临时延期。《文艺报》第4期“编者的话”中做出了如下说明：“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已决定延期在2月27日召开。在以后的几期中，我们将发表会议的报告和重要的发言。”^[8]

原定于2月20日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为何在具体日期上又做出了推迟决定？在“编者的话”中，《文艺报》并未对此给出明确的解释，在郭小川的日记中，也并未对此有过多记录。但笔者在爬梳相关资料时，发现此次会议的主题有过一次微妙的变化，其复杂过程兼带着突然的临时延迟一并呈现于郭小川作为参与人所记录的检讨材料中。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初次（1月30日）发布召开消息时，对即将召开的会议作了简单的会议主题和内容介绍，“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将由周扬作‘文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和创作问题的报告’”^[9]。众所周知，周扬作为此一时期文艺政策的最核心的代言人，其文艺报告在精神上紧跟中央，内容会直接关系到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文艺动态与导向。然而，原定为“文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和创作问题的报告”到最后理事会召开时（2月27日）却改成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为主题的报告，从态度倾向、主题选择上就显示出一些鲜明的转向与别样的意味来。这是第一次将“社会主义文学”提上官方层面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意味着现在即将步入社会主义阶段了，也意味着已基本完成思想意识形态的整合目标，因而以往强调的“文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不再作为中心工作来布置。

这种转变与突然延迟的召开日期之间是否有着密切联系？郭小川在《检讨书·关于丁陈问题》中回忆了他在1955年调到作协之后参与的诸多事宜，涉及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的有如下两则：

1956年《文艺报》第3号（1月15日出版）的社论《迎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也是我起草的，后又经林默涵、

刘白羽等修改过。这篇社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状况，做了完全颠倒的估计。^[10]

这里，他所谓“完全颠倒的估计”，是因为这次报导开始有了将“思想斗争”向“社会主义文学建设”转变的预估和表述迹象。郭小川的检讨写于“文革”之中，他的认罪态度对他的陈述语词均有一定影响，在其陈述中，对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筹划状况认识予以完全否定，目的是为批判自己1956年开始时对文学状况中的“思想斗争”转向与估计不足造成的后果。但从郭小川在检讨书中的说辞也可以发现，对文学形势与文学政策的理解在当时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此外，在《检讨书》中他还谈到：

一、茅盾的《开幕词》，是我重写的。二、周扬的黑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我是参加过讨论的。一次是2月6日，周扬约了我、康濯、秦兆阳去谈他的报告。主要由康、秦讲了创作情况；另一次是2月14日，在旧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讨论了周扬的报告，我虽然没有发言，但对他的报告内容也是同意的。三、茅盾的《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的报告，先由公木等起草，又经我修改过。我究竟改了哪些地方？记不得了。但一定改了不少。四、老舍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我也修改过。^[11]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所参与撰写、修改的诸多作协领导发言稿这段时间内经过了紧急密集的修改。1月30日《文艺报》社论记录的有关作协理事会的消息记录还是“文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和创作问题的报告”，到2月6日，郭小川参加了周扬报告的改稿会，会后回家撰写《迎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社论。此时的社论是充分接受了周扬会议指导精神后所创作的，开始提出，“如何进一步发展文学事业，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它更好地担负起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斗争的任务”^[12]，也即郭小川在《检讨书》中所言的“完全颠倒的估计”，但事实上，在这个社论中还是有极大的部分在强调思想斗争且尚未完全明确“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的主题措辞。而2月14日周扬的发言报告再

次经过集体讨论与修改，具体细节未知。但由此可以知道，周扬报告从1月30日的“文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和创作问题的报告”到最后呈现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最少经历了两次集体修改，且确实存在一个不断转变及明确的过程。这种明确与集体修改反映了这次会议在两种政策之间转变的难度与反复摇摆。周扬报告之后，还有茅盾、老舍等多人报告的修改与措辞等工作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完成，虽然郭小川不是唯一撰写人，但主题报告的确认往往是最重要的，而其他发言人如茅盾的《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老舍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以不同侧面不同重点谈到了会议的精神与工作开展重点，在整体精神和论述尺度上与主题报告保持一致。另外，郭小川还提到《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至1967年工作纲要》由他经手参与，于1956年2月12日、13日、16日、17日也在不断讨论、修改。因此，可以推断会议召开时间的临时推迟极有可能与会议主题精神的转变与集体修改有着密切联系。

1956年2月27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正式召开，这次理事会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的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接见了与会文学工作者。3月2日下午，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员与参会人员合影，以毛泽东为首接见作协理事会的代表，这是唯一的一次。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最终以“扩大”的形式召开。在第一次作协理事会上，产生的中国作协理事成员包括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冯雪峰、巴金、柯仲平、老舍、邵荃麟及胡风等一共88人。一般而言，理事会只有理事成员参加，而历经数次文学批判，此次理事会人员有所变动，且采取了“扩大”的召开方式，“出席会议的除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外，还有一部分作家，新疆、内蒙、延边等地区的某些兄弟民族作家和各省、市文艺工作的负责人”^[13]。有意放开参会人员限制，以跨领域、各地集中、各民族集中的方式召开的“扩大理事会”，这也从另一层面凸显了此次会议的特殊性，其以扩大为目的性的传播方式，不断获得深度动员、传播效应。

从郭小川所记录的这些修改日期、《文艺报》

对这次会议的前后几次报道措辞信息，同时对照会议召开主题与召开时间的客观变动可以发现，筹备中的繁复、变动与集体修改，均反映了这次作协理事会召开时文艺环境与文艺政策初变时呈现的拉锯状态。从中央上层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与会议召开，到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召开，作协相关领导人明显在接受中央影响后开始着手改变。但关键一步的“试探”与“放松”并不容易，作协需要在执行与运作时准确把握好“度”，这种“度”的反应既呈现在主题措辞变化中，同时还落实在会议召开中，如何有效、有力、准确地传达来自上面的信息，并且不破坏前一阶段紧迫政策的“思想改造”效力，从而达到有效弥合两种政策之间存在的缝隙。这种百花文学发生期的动态性、反复性的特征，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预热、筹备过程到后面的召开过程均可窥见一斑。而此次会议谈及的青年创作问题、繁荣文学创作的问题其后在全国首届青年创作者大会、全国编辑工作会议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二 新生力量、苏共二十大 与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

紧承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之后，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于3月15日到3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联合召开。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机动召开时间”与扩大形式显示出的“突兀”稍有不同，首届青创会早在1954年便进入作协工作计划内，但这次会议同样受党的八大召开与苏共二十大前后的政治文学气氛影响，首创即影响深远。由这次会议所发现、鼓动的新生文学力量成为百花文学创作潮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1956—1957年间受时代风潮感染激情投入创作之中，后又随潮沉寂，多年之后，作为“重放的鲜花”的一部分再登文坛，携百花文学精神，再次激活文学现场。

有关首届青创会的创制构想可以追溯到，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第1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初步意见》，决定由老舍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刘白羽任副主任，李

季、韦君宜、马烽、陈白尘等15人为委员^[14]。1955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发布《关于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初步意见》，明确此次会议的召开目标是“以解决青年文学创作者中存在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上的具体问题为中心”^[15]。作为会议执行组织人员之一，公木在首届青创会的组织筹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菱在回忆公木的传记作品《我的祖父》中有所记录：“1956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国务院为这次会议批了三万元钱。我的祖父负责领导、组织了这次会议。与会者五百多人，会期两周。这个会是和团中央合办的，团中央无偿提供礼堂作为会址。”^[16]此外，贺朗也曾回忆他参与审读参会青年作家作品的过程，“1956年3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会前，成立了筹委会办公室。我被调到办公室负责审读从全国各地送来的青年作者的作品。这个会不是代表大会，而是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参加会议者是根据其作品水平决定的”^[17]。这些人的回忆从不同侧面组合拼接出这次会议的策划与准备过程，也可以看出当时文艺界不同层次的力量积极应对姿态，而对青年作家资质的筛选则从侧面表明此会议的国家选拔性质，这对当时的青年作家登上历史舞台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达到满意的会议动员效果，青创会在召开之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青年作家”及“文学新生力量”。中国作家协会“青年文学创作选集”委员会在会议召开之前编选了青年文学创作选集，共十本，包括小说四本、戏剧两本，散文、诗歌、儿童文学、说唱文学各一本。从维熙、李準、王愿坚、方之、高晓声、刘绍棠、王蒙、邵燕祥等人的作品均入选。有关这套选集的介绍写明，“这套选集所收入的作品，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1955年12月底为止，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已经发表的青年作者的作品，这些作者绝大部分为三十岁以下的青年……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初步地检阅近年来青年文学作者的成绩，可以帮助青年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互相学习，进一步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18]。而《文艺报》早在1955年便发布有关

的消息，“青年作家的作品选集的编选工作开始得较早……编者阅读了近年来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所有文学作品，具有一定成绩的青年作家都有作品被选入，估计也将有一百五十万字左右。这一种选集的编辑出版，对文学队伍中的新生力量将是一个有力的鼓励”^[19]。选集入选人员，后来大多参与或列席此次会议。此外，其他有关青创会的相关筹备情况，也可从当时中国作协创办的针对青年文学创作的《文艺学习》及作家协会的《作家通讯》中获得，如《作家通讯》1955年7月号发表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筹备委员名单》，茅盾1956年发表于《文艺学习》第1期中的《迎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

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召开时的摇摆的试探姿态稍微不同，此次会议在“松动”的尺度和口吻上有所拓展，这一点与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有关。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几乎同时，苏共二十大于2月14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24日深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轰动性新闻因为与2月27日召开的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相隔过近，影响还未来得及产生。但到了3月15日召开首届青创会时，苏共二十大的消息所引发的震动已经逐渐显露，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由此开启的去斯大林化与民主化都产生了极强的余波。韦君宜曾回忆，“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20]。黄秋耘也谈到，“那时作协内部是由刘白羽向我们传达的”，“大家听过传达出来以后，失魂落魄，震动得很厉害”^[21]。很快，这种当时停留在局部范围的影响随着形势变化逐渐扩散开来，据黎之回忆，“同年3月15日到30日作家协会同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会上，周扬作了报告……这次会议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反个人迷信在我国知识界也引起注意。所以在周扬的报告中提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他还讲了个人迷信的危害性。……会上，茅盾、夏衍、老舍也讲了话”^[22]。从黎之的回忆中，也可看到苏共二十大对此次会议的影响，这种风向经文艺领导者之口传达至数百青年作家耳中，使初登文坛的新

生力量产生敏感并催化。

最后，这次会议于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幕，刘白羽致开幕词，他说“这是一次动员会议，也是一次学习会议”^[23]，会议的召开过程充满活力，“在会上，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同志作了报告。许多作家针对如何深入生活、如何提高艺术创作技巧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和阐述。青年作者有二十余人作了报告和讲话，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谈自己在创作中的体会和感受。作协有茅盾、周扬、刘白羽等讲话；团中央方面有胡耀邦、冯文斌、项南、徐惟诚（当时团中央候补书记）等讲话；还有总工会的负责人、社会名人和许广平等人讲话”^[24]。总体来说，此次会议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口吻及精神是基本一致的，目标均放在对文学创作问题的直面与突围之上，重点都提到了写作上公式化、概念化，回避矛盾冲突的创作弊病。譬如在此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小说一组的讨论中“着重讨论了创造人物和写矛盾冲突的问题……有的同志说，在作品中不敢写重大尖锐的矛盾，不敢写先进人物的缺点”；小说二组中也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例，认为刘绍棠、从维熙等人的作品，“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是从生活出发，在对冲突以及人物思想感情的描写上，克服了一般化”。对于创作问题的针对性探讨，与对写矛盾冲突的明确一致，使得这次会议在会后青年创作中产生了明确的效应，也回应了刘白羽所说的“动员会议”的效果。

但与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相比，此次会议的话题明显更为敞开，气氛更为热烈活泼。赵树理在发言时提到，此次会议，“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是直截了当有甚么说甚么，不摆架子，不绕弯子，表现出青年和实际工作者的特点。发言的内容是提的问题多，谈的教训多，谈的经验少”^[25]。当年与会的王蒙在回忆录中写道：“众与会者跟得了气成了仙一样”，“在这个会议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第一个是‘发’，指的是发表……第二个词是集子……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的强得多阔得多了。”^[26]这些与会者对此次会议颇具现场感的回忆都呈现了当时的会议气氛、话题探讨维度，构成了关于此次会议的剪

影，从不同侧面呈现出这次会议的历史性意义。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作出“繁荣文学创作”的总体规划后，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在承继茅盾在理事会的发言《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基础上，通过对当时青年作家的选拔与号召，以会议集聚力量进一步深化、扩展了有关青年作家的培养计划；也因这次会议对公式化、概念化等创作问题的批判，使得他们真正重视当时创作层面的痼疾，以青春活跃的创作、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投入创作实践中，形成对凝滞的创作局面的突围，将这会议气息、会议精神变成实际“干预生活”的创作热情。

三 1956年全国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策动与百花文学期刊盛况

如果说在1956年2月召开的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还在两种不同文艺政策的间隙中小心试探，而3月召开的首届全国青创会已初露活泼苗头，那么，经历了党的八大的召开与“双百方针”明确之后于年末召开的“全国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可以说已经有了完全明朗化的姿态与论调，通过对全国期刊总的安排布置，使得文艺一线阵地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体创刊、改刊探索实践，并且这个环节的完成真正推动了百花文学从酝酿、推行、明确走向高潮。

郭小川是此次会议的实际组织者，在会议召开之前，作协早在4月已经开始筹备此次会议。1956年4月16日，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二时起，在白羽处谈最近的几个工作问题：①汇报三个会议的创作思想问题；②批判朱光潜的美学思想问题；③准备编辑工作会议问题……”^[27]其后，郭小川还多次出去进行编辑期刊工作调研，在《检讨书》中他回忆，“在会议准备期间，9月初到9月中，我曾到上海、武汉两地访问了不少资产阶级作家和教授、几个刊物的编辑部，回京后写了一个所谓的‘资料性的材料’，集中了他们的错误看法，提出了在刊物上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全面意见，这些意见就成了编辑工作会议的重要依据”^[28]。郭在这里所说的“资料性的材料”即《编辑会议纪要》，

这份前期调查资料对掌握当时文艺界刊物阵地存在的问题，以及编辑们的思想动向、大多数的建议及意愿有着重要作用。

1956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正式召开，周扬、老舍、刘白羽、郭小川、冯雪峰等人和各期刊编辑代表参加，郭小川致《开幕词》，周扬等人发表讲话，会后还组织了“五四”以来文学期刊展览，并邀请叶圣陶、楼适夷、阿英、徐调孚等老编辑介绍办刊经验。有关此次会议的召开情况，黎之有过回忆，“11月21日到12月1日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开得更加活跃。会议是郭小川作全面的组织工作。他这时已由中宣部调任作协秘书长。会上周扬讲话中讲不要怕片面性……同时，周扬提出可以考虑允许办同仁刊物，他这个讲话影响很大，后来文艺界不少人准备办同人刊物”^[29]。周扬的讲话只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敞开侧面，其他参与此次会议的人员，在这次会议上也作了许多深入大胆的问题探讨。比如冯雪峰在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的讲话尖锐地指出，“苏联文学的根本问题是教条主义”，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比，缺乏后者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还指出，“历史上伟大的作家们促进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我们丢了”，“我们的文学变成软弱无能”，“没有很好地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作家是看到了，但不敢讲话，思想有顾虑”，“文艺作品表面歌颂，不去反映新的困难”^[30]。他还公开提出，“现实主义与其说是创作方法，不如说是创作精神，即斗争的、为改造社会而奋斗的态度。仅仅说创作要忠于现实、创造典型等等，是不够的”^[31]。冯雪峰的话对问题的思索已经达到了前面两个会所不敢达到也没有达到的深度，这种深度既是在前两次会议破冰、推进产生的文坛“回暖”效应下的鼓舞，也与“双百”作为政策明确有着直接联系。受冯雪峰发言的影响，在这次会议后，秦兆阳动笔写了在百花时期产生重要影响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种探索已经从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现象表面而走向了问题实质，触及文艺体制、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核心问题。

最终，这次会议普遍形成的共识是，“大家都

认为贯彻这一方针（笔者注：双百方针）主要的是依靠报刊……各个文学刊物应该大胆放手地实行一方针，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文章，敢于发表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作品，并且特别提出，尖锐地批评生活中的缺点的文章和作品，只要不是恶意的诽谤，就应该发表。要真正做到‘大胆放手’……‘机关刊物’这个说法，到现在成了对刊物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种束缚，大家都同意从明年1月起，各文学刊物一律取消这个‘头衔’”^[32]。应该说，这些共识在之后的文学期刊办刊实践中得到了全面有力地执行。“取消机关刊物”“自由的学术辩论空气”“大胆地鸣”“大胆地放”都成为直接贯穿百花文学现场的具体措施与精神指导。后来郭小川在检讨书中谈到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时，他作了深刻自我批判：“这个黑会的方针是周扬和旧作协党组定的，会议也是由周扬指挥的，但会议的具体主持者却是我。这个黑会的中心问题是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级政策，歪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议纪要》是我起草的，会议期间举办的五四以来的文学刊物展览会是我组织的。我在会前会后作了多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我帮助周扬通过这一黑会使全国的重要的舆论阵地——文艺刊物进一步成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这个黑会的影响是很恶劣的，流毒是很广泛的！”^[33]是否使文艺刊物成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包含特定时代的特殊历史认识，但这次会议的影响广泛确属客观评价。

在这次会议之后，众多的创刊、改刊行为，都在这次会议的精神传递与策动、在《人民文学》的改刊实践行为中获得了贯彻执行的方法与路径。在这次会议后，《诗刊》《收获》《星星》等重要文学刊物创刊，而各地文艺报刊也推行改刊、改版，如在此期间《河北文艺》改为《蜜蜂》重新创刊发行，《贵州文艺》改为《山花》，《江苏文艺》改为《雨花》，《内蒙古文艺》改为《草原》，等等。这些新创办及改刊的刊物，一时间内改变风尚，发表了构成百花文学创作潮流的众多文学作品。同时，因在会议上提倡“同人文学”，后来有了江苏《探求者》等同人刊物的先锋行为。

四 “百花文学系列会议”的评价 问题及文学史意义

从中央上层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党的八大召开的准备，到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召开、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再到年末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百花文学系列会议”伴随了“双百方针”从酝酿、提出到贯彻的整个过程，这三个会议真正开始直面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法，可以说得上是建设性的文学会议，其与百花文学的发生发展无论是从渊源还是从事件、实践中均能找出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在上文中也已有所涉及并呈现。如何评价这样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会议？在共和国文学史上数不清大大小小的文学会议中，“百花文学系列会议”有着怎样的文学史价值与文学史地位？这都是我们需要予以重新认识与界定的。

（一）从“公式化、概念化问题”到“现实主义”与“写真实”的深化

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将“公式化、概念化”问题当作分析文学创作僵化的一个切口，在首届全国青创会上、全国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不断扩展话语空间，最终突破表层话语策略，深入对教条主义、文学与政治关系、现实主义精神等实质性话题的反思中，形成了百花文学探索中对“写真实”“现实主义精神”的确认与实践。

以周扬为典型，他在分析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时，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中提出“无冲突论”是造成这种写作局面的首要原因，而“无冲突论”首先是因为对于斗争生活深入不够，其次是因缺乏直面与书写的勇气^[34]。这种论述自然有道理，但把主要原因归于作家个体的勇气还是疲软地停留在表面。而到首届全国青创会召开时，虽然议题仍旧是“公式化、概念化”，但周扬自己对“个人迷信”的批评，对苏联文学动态的介绍，逐渐将写作僵化的因由从个体引向外部，使得与会者也逐渐解放思维。再到首届期刊编辑会议时，周扬所谓“写片面”也就是提倡“写问题”“写阴暗面”与呈现“批判性”。实质上，这三次会议对“公式化、概

念化”的思索，以“无冲突论”为反思路径，最终确定了百花文学“写冲突”“写矛盾”的改造方法，而对造成“不写冲突”的原因的分析，也由作家个体的缺乏勇气延伸到主导文艺理论的反复、放开的局限，再到教条主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反思，实现了层层深化，有力碰触到了问题根本。

可以说，没有这些思想理路上的清理，没有对文艺上层指导思想上的突围，没有来自文艺界领导口径的层层放开，就没有对“典型论”“真实性”“现实主义”的讨论，也就没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学是人学》《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艺理论及文艺认识问题上的深入。而没有这些意识与思想上的突围，文艺在当时局面下短时间内很难形成绚烂的百花文学。

（二）“干预生活”的写作潮流

由“无冲突”到“写矛盾”，再到“干预生活”，这是从思想理路到创作实践的跨越，当然这几个概念的争鸣与讨论是相伴进行的，但如果“双百方针”的争鸣与探索只能落在理论层面，不触及实际作家作品，也无法构成真正的百花文学实绩。百花文学的实质，被公认为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核心、一定程度上恢复文学自由探索的“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干预生活”的主体力量很大一部分正是当时初登文坛的那批青年作家（以第一次青创会参会者为主体的新生力量），正因如此，如果说我们把百花文学实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定位在“干预生活”的创作实践上，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忽视百花文学系列会议，尤其是首届全国青年创作者大会的影响。正如黎之多年后在谈到首届青创会时所说，“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中年作家大都是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如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陆文夫等人”，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对写矛盾冲突的倡导，对“干预生活”热情的鼓舞，所以黎之评价“这次会开得很好”^[35]。从黎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会议对当时的青年作家“干预生活”的创作实践所起的客观作用。

当然，这也离不开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试探、破冰，与全国期刊编辑会议的刊物阵地推动。概言之，当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

会议试探性地提出“必须勇敢地正视生活和干预生活”，再到“干预生活”在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提倡与讨论，“干预生活”最终确定为一种号召，成为青年作家的创作指导方法，而当期刊编辑会议的举行带来编辑思想转变时，刊物阵地的焕然一新也为青年作家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发表的平台。于是，在其后出现了批评官僚主义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改选》（李国文）、《沉默》（秦兆阳）等短篇小说，涌现了战斗的《办公厅主任》（李易）、《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等特写作品，诞生了《草木篇》（流沙河）、《画鸟的猎人》（艾青）、《贾桂香》（邵燕祥）等“好的抒情诗与有力的讽刺诗”，同时，在反思“现实主义”与“真实”问题的《文艺批评的歧路》（于晴）、《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蔡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陈涌）、《写真实》（刘绍棠、从维熙）等理论文章中继续深化探索了现实主义、真实性、典型、歌颂与暴露、文艺与政治等重要问题。从上述种种中，都可以看到由“干预生活”在文学创作与突围中所引起的显著影响。

（三）文学制度建设与百花精神的历史遗产

这三次会议，以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为宏观总则，以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和编辑工作会议为细化，后两次会议以前一次会议的经验为基础，每一次会议都在政策语境的变化中往前拓进，通过会议的形式，建设了很多刊物、形成了一些文学规定，这种制度性的内容，对“十七年”文学发展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对“文革”后新时期文学结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比如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形成的《纲领》，这个纲领中确定的一些重要事项，成为百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这个纲要的第六部分中，对期刊的编辑出版具化到了个体刊物上，第36条“改办和创办新的报刊如下：一九五六年将现在的‘文艺报’改办为具有群众性和政治性的文化艺术的报纸（三日刊）。西安创办综合性的文艺期刊‘延河’（月刊）。天津创办综合性的文艺期刊‘新港’（月刊）。上海创办指导青年文学创作、刊载青年和工农兵群众的文学作品的‘萌芽’（半月刊）”。第39条，“1956年召开全国文学报刊

的编辑会议，讨论改进编辑工作、提高文学报刊的质量问题。以后每隔两三年召开一次文学报刊的编辑会议”^[36]，等等，这些都是直接参与百花文学建设的实例。又如，《纲领》第三部分还专门谈了“培养青年文学力量”这个问题，通过通讯员制度、文学讲习所、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专门学员等制度设计来确立这个群体在共和国文学中的重点培养地位。这些由这次会议所设计的文学制度即便是在1957年后，也有一部分得以保留，并且在继续培养文学新生力量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再如，理事会会议确立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集体领导机制，成立了“书记处”，并写明“书记处是一个集体的工作机构”，在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上，它提出了“提倡自由辩论的方式和同志式的原则性批评，反对文艺批判中的简单的武断的作风”，并作为这个纲要的第七条来呈现。作家协会成立“书记处”这种集体领导机构是对党的八大创新领导机制、加强集体领导机制的一种模仿与局部建设，有益于决策民主的实现，为制度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今天我们如何理解百花文学的精神？百花文学自然是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文学领域内的自由讨论、尊重文学多样性及文艺发展规律的文学创作潮流，但百花文学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先进文化、探索文艺领域内民主政治建设途径的一种历史实践。而“百花文学系列会议”通过会议对文学工作从“批判”“斗争”转向“建设”，对文学产生了巨大推动效应。无疑，“双百”方针的提出对百花文学至为关键，但是更需明确的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并非只针对文学层面，其会议精神与潜在对象依旧是知识分子，针对的也是文艺科学整体工作，也就是说会议与会议之间还存在一个等级级差的问题，落实到文学层面依旧需要文学层面的会议来分解、推动、讨论、执行。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也无法忽视“百花文学系列会议”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可以说，正是这种通过这一系列会议推动拓展的自由、开放、宽容的文化环境以及对文化制度、文化格局的合理设计，使得文学创作与理论争鸣上出现了共和国文学史上的一次绚烂繁荣。

这种探索模式，其实践意义在于为党的文化领

导政策、文化领导模式提供了方法与借鉴。同时，“百花文学系列会议”还体现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一文艺领导组织机构在集中动员、推动建设方面的作用，其本身也是我国民主集中政治体制的一种局部反应。这一系列实践探索，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途径、方法与经验教训。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界同样是通过第四次文代会、1980年全国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等再次团结文艺界知识分子、重建文学期刊。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第二次作协理事会扩大会议几乎一样。曾经在1956年创刊改刊的杂志阵地在1980年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前后也逐渐重建，接续历史传统。那些曾经作为“新生力量”的“归来者”（如王蒙等人）与30年代的一批老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作为“重放的鲜花”再回文坛。这三次会议的领导者、参与者与实践者在新的会议、“旧”的传统中重新汇聚，“双百方针”也在经历了实践检验后确立了自己的历史意义。

[1] 参见吴俊《批评史：国家文学和制度规范的视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若干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2] 《周恩来传（1898—1976）》（下），金冲及主编，第1079—10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 《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人民文学》1953年第49期。

[4][5][27]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日记1944—1956）》，第377—378页，第380页，第4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9] 《中国作家协会将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文艺报》1956年第2期。

[7] “2月6日……回来开始写关于理事会的《文艺报》社论”。郭小川：《郭小川全集（日记1944—1956）》，第389页。

[8] 《编者的话》，《文艺报》1956年第4期。

[10][11][28][33] 郭小川：《检讨书》，第98页，第100页，第229页，第22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12] 《社论》，《文艺报》1956年第3期。

[13] 《后记》，《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第4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4] 《老舍年谱》（下），张桂兴编，第63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5] 《关于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初步意见》，《作家通讯》1955年7月号。

[16][24] 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第205页，第20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17] 贺朗：《萧殷师教我做个革命人》，《百年萧殷纪念文集》，黄树森编，第367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18] 《编辑说明》，《粮食》，第iii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

[19] 《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编选新创作选集》，《文艺报》1955年第24期。

[20] 韦君宜：《思痛录》，第40页，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1] 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下）》，《回应韦君宜》，邢小群等编，第210—211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2][29][35] 黎之：《文坛风云录》，第50页，第51页，第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23] 《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开幕》，《新华社新闻稿》1956年3月16日。

[25] 赵树理：《和青年作者谈创作》，《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30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6] 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127—128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30] 王培元：《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31] 转引自唐弢《论阿Q的典型性格》，《燕雏集》，第117页，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32] 本刊记者：《办好文学期刊 促进“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34]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第18—27页。

[36] 《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第105—106页。

[作者单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罗雅琳